介绍《雍正朱批谕旨索引稿》

（日） 小野和子撰 陈桦译

东洋史研究会曾四次在《东洋史研究》杂志上组织“雍正时代史研究”专集，一九八六年又将它们合编成册，取名《雍正时代的研究》刊行于世。其所载论文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雍正朱批谕旨之研究”研究班的一部分研究成果。作为基础课题，该研究班同时还从事摘写《雍正朱批谕旨》索引卡片的工作，并在中断了一个时期后，于一九八五年完成。这些索引卡片大部分将不向公众发表。人文科学研究所已把它们每十张辑为一页，影印两部。现又增印五部，定名《雍正朱批谕旨索引稿》(约一二〇〇〇页)，以寄赠有关研究机构。

上述卡片不论作为《雍正朱批谕旨》一书的内容索引，还是词汇索引，对研究者都非常有益，由于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词汇尤其丰富，所以又具备了工具书的特点。但是，这部书并未用活字排版公开发行，如前所述，仅增印五部馈赠各研究机构，因此有必要向研究者们做一番介绍。为方便利用，应预先了解它的编纂过程及使用方法。经同东洋史研究会会长宫崎市定、副会长谷川道雄两先生商定，兹将该书影印本卷头之编撰缘起、索引凡例以及索引制作者姓名刊载如下。

雍正朱批谕旨索引缘起

惟理解前清三百年兴废之管钥，在知雍正一代之政，而雍正一代史料之粹，独推朱批谕旨。雍正在位，虽止十三年，然其政之重且要，则驾康熙乾隆六十年而出其上。所以能使前清为前清，不袭蒙元短祚之辙者，雍正创制之卓伟，职之由耳。雍正一代史料浩瀚，云海不啻。然宝训实录，乃一面之言，片见之辞，会典条例，则官衙馀录，吏牍残纸而已。至於朱批谕旨，实为君臣上下往复研磨之论，自督抚之贤否，风俗之醇醨，晴雨之时应，粮价之高低，凡生民休戚之所关者，瞭如指掌。古今东西，安有如此书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安部健夫教授，夙早致思於此，欲组织研究班，与余谋之。昭和二十四年，同发檄移，鸠募同志，乃得十余名。期以每星期五下午开会，轮流讲解，一句义训，苟存疑团，反复讨论，不知日昃，盖有昔吾友尝从事于斯矣之慨。关键语句，随读随录，拮据十年，获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资助，录存卡片，无虑数万。岂料安部教授昭和三十四年忽焉逝世，余接其后，代之主持者六年，亦告老退休。其次承绪者，则小野川秀美教授、佐伯富教授也。昭和四十五年，不图遭遇研究班解散，中绝其业，卡片九万，空藏匣裹。唯佐伯教授继续研究于文学部演习课中耳。至于昭和五十一年，人文科学研究所小野和子助教授组织明清时代政治与社会研究班，而与其班员俱复开索引工作。昭和五十六、八年，特获三岛海云纪念财团资助，又得井上进助教协力，黾勉从事，新录卡片三万，与旧共计十二万，涉猎几全。又复印副本二部，以供众人阅览之便。此业创始以来，时有驰张，前后阅年，三十有五，当初青壮，今已鬓发斑白，或者华甲，或者古稀，余亦颓然耋矣。近获告竣之报，欣快不已。回忆旧时，聊述缘起，庶几以传后世。倘或犹有遗漏，拾遗更俟百年矣。

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年）三月　宫崎市定记
清水茂译

凡　例

一九八五年三月，《雍正朱批谕旨》索引卡片的整理工作终于完成。

卡片现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总数逾十二万张。此次将它们影印五部，取名《雍正朱批谕旨索引稿》，寄赠给下面的国内外研究机构：

北京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台北　故宫博物院
东京　东洋文库
京都　京都大学文学部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在四分之一世纪的长时期内，由人文科学研究所内外众多研究者共同努力完成的这项事业，能够为国内外学者们提供研究之便，其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贺的事情。值此机会，具体地介绍索引卡片的制做过程，详细解释索引凡例，将对使用索引的研究者们不无帮助。

（一）《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通读全书不是从第一卷开始，该书石印本共计六十册，由十名或十一名研究者分担，每人五册乃至十册不等，三人一组，顺次会读。会读所用底本是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木活字本（宫崎市定先生得到殿版本，藏之文学部则为研究会成立数年后的事）。各册承担者预先细读所承担部分的奏折，会读结束后，按以下顺序，摘录必要项目，填写索引卡片。

（1）确定各奏折有哪些论题，分立条目，如关税、耗羡、人事等等。条目名称可以非奏折内语言，但必须反映奏折的内容。然后将它们写于卡片的标题一栏内，下划波线～～。由此，奏折的全部论题一目了然。

（2）根据奏折内容，将奏折分成或长或短的若干段落，每段文字在数行至十行之间，并拟出各段题目。文字较长的题目在续接时，标以a、b、c，如关税a、关税b。通过上述步骤，将各文段的全文笔写于卡片上，这样卡片即可作为史料来利用。但此次影印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卡片的里面不得不予省略。

后一时期编制的索引，因要加快进度，而未抄写全文，只是摘录其最初二字和最后两字，中间文章略去，连以点线。一九六五年，台北文源书局影印本刊行，查找原文已比较容易，所以这样处理是可行的。

（3）挑取奏折各文段中出现的重要词汇，另立为项，并抄录与其前后衔接的文字三十字左右，以示该词汇的具体位置，同时于该文下添加（—→□□）的标记，意为“请见□□”。见此则知，对文章中的文段有更详细的说明。

（二）摘写奏折呈递人的官职、姓名、上奏年月日、与奏折有关的省分（以上各项在右上栏内）及其所在函、册、页、表里、行数（以上在左下栏内）等。出处栏内之〔版〕字，是指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木活字本《雍正朱批谕旨》，〔石〕则为石印本，以便从这两个版本中查找原文。但应特别注意的是，这些页、表里、行数并非指立项词汇的具体出处，而是指其说明文的起始文字位置。该词汇则多在次行、次次行，甚至次页出现。

（三）卡片按条目第一字的五十音顺序排列。同音者以汉字笔画为序，第一字相同的，

以第二字为准。经常音读的字，不一定采用习惯读法排列。检索时，请根据检索表来确认卡片的号码，以找到所需条目。

（四）卡片编排结束以后，即以之为底本，影印《索引稿》。由于是第一次编排，所以在排列顺序上难免有若干的错误或混乱之处，发现后虽然将原卡片恢复到正确位置，但它给影印带来极大影响，全面变更卡片的位置在技术上是困难的，因而只将排错者撤除，收入最后的补遗之中。

（五）卡片所摘各项均是在研究会上讨论选定的，仅反映了承担者的意向，而且每一时期的条目也繁简各异，非常不统一。研究之初，因是一边将那些意义不明或者需要注意的内容摘录在卡片上，一边解决会读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一定有许多遗漏之处。这次影印之际，未对它们予统一或删除。因为考虑，这也许是不必要的，保留原样或者更有益。故取名《索引稿》，今后还需做适当的整理和补充。

能够制成如此大量的卡片，并且整理、影印，确实是与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编制卡片需要数量可观的经费，为此，接受了以宫崎市定、安部健夫、佐伯富、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上山春平、小野和子为代表的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以及三岛海云纪念财团援助的奖励金。制做影印本时，又得到梅原郁、狭间直树为代表的科学研究费，以及岩见宏为班长的“明清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研究班捐献的研究费。在整理卡片的最后阶段，研究所助手滨田正美（现法政大学教授）、井上进以及文学部大学院生利光有纪（现文学部助手）、辻正博、中砂明德等，又花费宝贵时间，协力相助。在此特志感谢。

全书可用拼音及四角号码检索，并附有拼音、四角号码与日本汉字音的对照表，这全部由京都大学大型计算机中心的星野聪和人文科学研究所胜村哲也等完成。

在索引的编写过程中，宫崎市定先生始终给以鼓励，并为本索引稿撰写了前面所载的“雍正朱批谕旨索引缘起”一文。这篇文章是用三十年前研究班“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原稿用纸”写的，是先生呈现的一份厚礼，我非常感动。

今天，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都整理出版了许多宫中档，大量地利用历史档案已成为可能，本索引稿不仅是史料，同时也是工具书，衷心希望它能对国内外研究者有所帮助。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小野记

索引编写者姓名

安部健夫、宫崎市定、小野川秀美、佐伯富、山本隆义、荒木敏一、冈本午一、宫川尚志、日比野丈夫、岛田虔次、佐藤圭四郎、塚本俊孝、波多野善大、里井颜七郎、池田诚、岩见宏、谷光隆、狩野直祯、小野信尔、胜藤猛、河内良弘、近藤秀树、寺田隆信、惠谷俊之、山口迪子、梅原郁、永田英正、森正夫、小野寺郁夫、堀川哲南、吉川忠夫、砺波护、若松宽、中山齐、稻叶一郎、狭间直树、杨启樵、横山裕男、谷口规矩雄、胜村哲也、大谷敏夫、小玉新次郎、难波新治、杨合义、藤善真澄、近藤治、佐竹靖彦、杉村邦彦、藤田敬一、衣川强、西里喜行、金城正笃、上田早苗、植松正、神户辉夫、白西绅一郎、重松伸司、岛居一康、铃木敏昭、高畑纮志、柊真幸、朝野浩之、爱宕元、西村元照、长岛弘、铃木富子、坂出祥伸、黄汉超、孔飞力、彼得·高勒斯、岛田虔子、清水和美、西嶋隽洸、山本德子、足立启二、秋山元秀、井上裕正、岩井茂树、冈野昌子、河政植、阪仓笃秀、杉山正明、檀上

（下转第41页）

〔清史研究评介〕

一部填补清史研究空白的新作

——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

王　宏　钧

三百多年前，清军入关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这一变革，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转折的进程中，清朝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650）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远廉和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同志合著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就是一部全面研究多尔衮生平历史的专著。

这部书在系统地叙述多尔衮一生各个阶段活动的同时，紧密地结合了当时的社会和政局的变化，从而把多尔衮个人的经历和所作所为放到了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论述。在论述中著者不囿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例如：幼年的多尔衮，人们多以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爱子和汗位的潜在继承人。本书认为，少年多尔衮走的却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也正因为这样，才锻炼了多尔衮的才能，造就了他的出众素质。对于多尔衮的生母、努尔哈赤的大福晋阿巴亥被迫自杀、为夫殉葬的真实原因，著者从满族的习俗和当时后金王室内部的矛盾斗争，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指出所谓“先帝有命”是无稽之谈，这不过是诸王贝勒在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手段。再如，对于清太宗皇太极暴逝、诸王争位这个老题目，著者通过对清室各派力量的分析，探讨了多尔衮拥立福临的原因，阐述了决定辅政王人选的因素，使这方面的研究更为深入。

多尔衮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清军入关和以后几年，即顺治元年至七年。清初这段时间的史实记载虽然很多，但关于多尔衮个人的直接史料，除《多尔衮摄政日记》以外，可以说寥寥无几。著者从大量的清初档案和《清实录》中，钩沉抉微，对许多问题如满州贵族的内部矛盾、清初满汉关系的格局、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法律制度和对朝鲜的关系等，都作了新的探索。对于多尔衮镇压农民军和抗清势力、厉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也给予了应有的分析和贬斥，而没有在写人物传记中出现往往对传主溢美和拔高的弊病。此外，本书作为一部清史学术专著，在文字的可读性和生动性方面也作出了努力，这也是值得广大读者欢迎的。

（上接第48页）

宽、西村かずよ、松浦章、森纪子、北村敬直、闲野潜龙、大泽显浩、村尾进、利光有纪、荻原淳平、山根幸夫、竺沙雅章、夫马进、福本雅一、滨田正美、井上进、小野和子。

〔译自《东洋史研究》第45卷〕